

“学者应当有两支笔，一支写学术，一支写文学。”中山大学教授黄仕忠始终铭记着他的导师徐朔方先生和王季思先生当年的教导。

在中国戏曲史研究领域，黄仕忠教授数十年孜孜以求，成果卓著。最近，他出版了散文集《进学记》，记录他从一个爱读书的乡村孩子成长为高校教师的漫长旅程，亦描摹了诸多师友的风采，透过书中人事，隐约可见一个渐行渐远的时代的背影。黄仕忠的夫人、学而优书店创始人陈定方在序言中称他是“新锐随笔作者”，也有朋友打趣他是“被学术耽误了的作家”。

近日，黄仕忠教授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就读书、治学、写作、阅读等，与读者分享他的宝贵经验和感悟——

黄仕忠：“硬读”“硬写”是学术研究必经之路

贰 做学问要守得住静气

羊城晚报：您如何看待“学者要坐得住冷板凳”的说法？

黄仕忠：我不太喜欢这个说法，因为做学问并不存在“冷”的问题，同时也从来不会太热闹。真正投身学术的人，热情似火，乐在其中。因为读书求知，本是乐事，但这种快乐需要在静静地阅读中，细细地咀嚼、品味。

羊城晚报：上个世纪90年代初，正是全民经商热潮兴起的时候，您也心动过吗？

黄仕忠：从读研究生开始，我就很清醒地知道自己未来想要什么——做学问，做一名合格的学者。走出小山村，在很多人看来，只要在省城有一份工作然后结婚生子，人生就圆满了。但我认为只读了本科、硕士，积累不够厚，视野不够宽，长期停留在一所大学，会限制自己的发展，于是放弃在杭州大学的教职，南下广州读博士。

1993年，我已经是中山大学副教授了，但我觉得自己的求学经历主要在江南与岭南，而学术的中心在北京，我必须去了解。当时刚设立文科博士后流动站，我因条件受限而申请未果，却依然选择北上北京大学访学一年。

羊城晚报：您未来在文学方向上还有什么创作计划？

黄仕忠：徐朔方先生说，做文学研究的人，写论文一定要有可读性；学者应当有“两支笔”，一支写学术，一支写文学。我近年在整理古籍、做文献研究之余，还写了一批回忆故乡的文字，结集为《钱家山下——乡土社会风俗随笔》，近期会出版。现在还有一个想法，就是用随笔的形式来书写我对于戏曲史、文学史的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让学术性与可读性相结合。实证性学术文章要求材料翔实严谨，在随笔写作里，则允许更多大胆的想象与推测。我也许可以重构想象中的历史，把故事讲得更有趣一些。



参 读书不能停留在“舒适区”

羊城晚报：《进学记》中描述了80、90年代的高校教学与生活，您感觉现在的高校氛围和以往有何不同？

黄仕忠：那个年代的大部分学生都有着艰苦的生活经历，能考上大学主要靠自学，有自觉的意识，喜欢读书。大家都是从基础文献阅读开始，带着怀疑精神去探究，待读书有所得，就写成文章。但是现在的学生，一入学就考虑如何发论文，“主题先行”，只检索资料，而不是先读基础文献，所以我常感慨现在大多数人都是来“做论文”的，而不是来“做学术”的。

做人文学术研究，其实如同农民种地，做一个项目，研究一个专题，犹如耕种一块土地。需要先划定范围，平整地块，引水筑坝，继而深耕播种。果树五年才能结果，苗木十年方能成材，这中间的过程最是难熬，需要耐心养着，也需要学会安排，因为地块上还可以种些粮食的嘛。现在许多人一块地还没认真去种，就在想要怎么才有产出，便只会助长焦虑而于事无补。所以我经常请学生细想“只问耕耘，莫问收获”的含义。

羊城晚报：您大学时期读书的状态是怎样的？有什么经验诀窍吗？

黄仕忠：进大学时中文系有“必读书目”，大多是我没听说过的外国名著，但读不懂，但是老师说这是名著，你得读，那就只好硬读。一本一本慢慢啃，等读了十来本以后，忽然就有了一点感觉了，慢慢能够欣赏到外国小说描写的妙处，读过几十上百本之后，就开窍了，能比较中

外小说的长短了。

在研究生时，我开始系统地读古代戏曲原著，也是味同嚼蜡，云里雾里。但我自己定了要求：读完之后，没有感觉、没有搞懂，也得调动所有知识与理论，写出一份札记，我称之为“胡思硬写”。我现在也拿来教育学生。因为通过“硬写”，你得把所拥有的知识都充分调动起来。再读课本时，慢慢就会有“抓手”了。

所以说读书不能停留在“舒适区”，有时候得硬着头皮读，读到足够多了以后，从量变到质变，慢慢便会找到感觉。这也是做学术研究的必经之路。

羊城晚报：现在电子阅读很普遍，以您的阅读经验来看，电子阅读和纸质阅读哪个更重要？

黄仕忠：我不太喜欢说哪个“更重要”，因为这样会把电子阅读和纸质阅读对立起来。首先，互

联网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我们更应思考如何在适应它的过程中加以正向引导。第二，亲眼所见的也不一定是事实，为什么这样讲？没有互

联网，不读书的人就会去读书吗？如今，几乎

每个人都有手机，意味

着所有人都是阅读者，

总的阅读人群和阅读频

次其实是升高的。虽然

对于一部分传统纸质书

的读者而言，碎片化的

阅读可能占比更大了，

但与此同时，原来的非

读者群体、边缘读者群体，也以电子阅读的方

式加入到阅读大军中。

我们应该观察在电子阅

读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

一代，他们会构成怎样的

阅读习惯，然后有针对性地加以引导，而不

是一味指责或叹息。

壹 用精气神串起记忆碎片

羊城晚报：您现在的日常生活大致是怎样的？

黄仕忠：我每天早上都从中山大学北门沿着滨江路快走到广州大桥下，然后返回。在行走中，思绪涌动，有许多句子从脑海中流淌而过。回到家，洗个澡，用过早餐，泡杯清茶，然后就开始写作；写累了，就又起身活动一下。我想送给年轻人一句话：注意锻炼，不要熬夜。

羊城晚报：《进学记》这本书也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完成的吗？

黄仕忠：是的。大部分文章是在近四年里，在这样的状态下陆续写成的。

羊城晚报：您的写作充满了细节描写，让人仿佛亲历现场，是如何做到的？

黄仕忠：其实每个人的记忆都是由一个个片段构成的，我们会清晰地记得具体的场景，那一刻人物的音容笑貌，甚至说话的语气、声调。我只是把脑海中的画面用文字还原出来而已。当然，记忆的碎片常常是散乱的、不连贯的，因此写一个人时，不能光去讲述他的故事，而是要捕捉他的精气神——找到一个人最鲜明的特质，以此为主线，把那些零散的碎片串联起来。

比如在《徐门问学记》中，我记述了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场景：徐朔方先生的母亲摔伤住院，我和几位同学作为帮手应约来到医院，一眼便看见徐朔方先生站在病房外的长廊上，双手捧着一本线装书读着。见我们到了，他赶紧合拢书本，带着歉意地说医生可能迟到几分钟，接着便问：“你们带书了没有？”

这样简单的一句询问，却在之后数十年里时常在我耳边回响。我不需

要说徐先生求知若渴、视学术为生命，等等，这一个场景便足矣，无须言他。

羊城晚报：《进学记》开篇第一辑便回忆起在徐、王两位导师门下问学的日子，这两位恩师对您来说有何特殊意义？

黄仕忠：在我读书的时候，所有人都怕徐朔方先生，坦白说，我也有点怕他。但徐先生告诉我：学术里不仅有“神”的存在。我觉得他这句话不仅在阐述学术的本质，更在解构我的那份畏惧——对他也应该作如是观。徐先生一直坚持实事求是、寻求真知，而非迎合世俗的要求；他不需要所有人都理解他，也就不用刻意讨好谁。这实际上是以“精神贵族”自勉的态度，是学者应有的内在自觉。

王季思先生则让我感受到学术和人生的关系。我在王老师门下时，他已经80岁了，但在此后的十年里他依然不断在写作。他觉得他活着的意义就在于还能写文章，还能指导学生、传授经验，学术是他生命最重要的部分。

羊城晚报：您未来在文学方向上还有什么创作计划？

黄仕忠：徐朔方先生说，做文学研究的人，写论文一定要有可读性；学者应当有“两支笔”，一支写学术，一支写文学。我近年在整理古籍、做文献研究之余，还写了一批回忆故乡的文字，结集为《钱家山下——乡土社会风俗随笔》，近期会出版。现在还有一个想法，就是用随笔的形式来书写我对于戏曲史、文学史的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让学术性与可读性相结合。实证性学术文章要求材料翔实严谨，在随笔写作里，则允许更多大胆的想象与推测。我也许可以重构想象中的历史，把故事讲得更有趣一些。



自己真正喜爱的学术，而这也是通过努力就可以自己做主要的领域，为什么还要去寻找那飘忽不定的、由他人做主的东西呢？所谓守得住静气，其实是源于吾心已定。

羊城晚报：您近二十年在东瀛访书、影书的感受如何？

黄仕忠：首先，在一家图书馆、一册一册地看书并做记录，构建了我的文献版本目录基础；同时在中日学者学术方式的比较中，在对日本近代学术形成过程的了解中，我拓展了国际学术视野。其次，我能感受到日本前辈学者的学术责任和担当，看到学术共同体的传承作用，让我坚信学者应当走在学术的大道上，而不能为世俗的观念以及考核指标等所左右。我到50岁后，老师辈学者们纷纷退居二线，我意识到自己也应该有学术的担当。所以后来我创办学术刊物《戏曲与俗文学研究》，为年轻一代学者组织学术会议，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希望中山大学在古代戏曲研究领域留下一份薪火相传的学术传统。我始终相信，学者应当做对学术有意义的研究，而有意义的学术一定能经受任何形式的考验，如果为了迎合考核指标而舍弃学术本身，那无异于舍本逐末。

羊城晚报：您的学术思路有何特别之处？

黄仕忠：真正的学术，大道至简，殊途同归。如果要具体地说我和其他研究者有哪些不同，那么，相比于人们常说的通过历史

来了解现实，我习惯通过观察现实来理解历史，然后再以历史为镜来反思现实，如此循环往复。因为古代的记录流传下来的东西太少，只有粗线条的轮廓，而现实所看到的都是鲜活的、丰富的，这些具体的感触都有助于我们对历史作想象。

羊城晚报：古代戏曲怎么和现实联系起来？

黄仕忠：很多年前，我带读小学的儿子去新疆，他背了一整套玄幻小说，7本全背在身上。在四个多小时的飞行中，我随手拿了一本看，意外发现还真不错。之后我也就关注了网络文学这一块。网络为创作者提供了无限的空间，虽然很多作品都堪称佳作，但若在数千万种作品中择取最优秀的百种，便不会逊于任何“严肃文学”。正如在古代戏曲小说难登大雅之堂，为正统文人所不屑。网络小说不正是古代的戏曲小说吗？汤显祖写《南柯记》，不就是当下的“穿越剧”吗？

羊城晚报：您大学时期读书的状态是怎样的？有什么经验诀窍吗？

黄仕忠：进大学时

人文周刊·七杯茶 A5



【有感于思】 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催生更多时代经典

对作家

艺术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出作品。没有作品，其他的活动搞得再热闹再花哨都没有用。现在，文艺创作的环境更加优良，创作条件、传播方式发生了很大变革，全社会对文化重要性的认识已经成为共识，与这些土壤和条件相匹配的、可称时代经典的作品，仍然在期待当中。可以说呼之欲出，又可以说还远远不够。

孕育催生深入人心的时代经典，一要形成崇尚经典、学习经典的风尚。中华文明绵延传承数千年，经典的文艺作品承载着中华文化的精髓。崇尚经典，真正能够读懂经典作家和作品，认识这些作品对于所处时代的真实表现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对创作者而言具有全方位的启示

意义。

现在，大家普遍对如何适应新传播方式感到急迫，对人工智能可能造成的创作影响感到焦虑，但对经典的回望，并从中认识创作规律、获得创作自信的自觉意识普遍缺乏，内在要求的动力不够。

二是需要作家艺术家真正能够潜心创作，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

现在文艺界的活动特别多，奖项特别多。各种排行榜、点击率、收视率、票房数据，随时都能看到。这些发布出来的结果，已经盖过了文艺批评的影响力。潜心创作不应该只是一种外在表达，而应落实到创作行动中。十年磨一剑不为所动地专注于创作是写作者的操守，出好作品出大作品是根本。

“1平米”可以做什么？在



【拒绝流行】

曹林 华中科技大学新传学院教授

小店、书架与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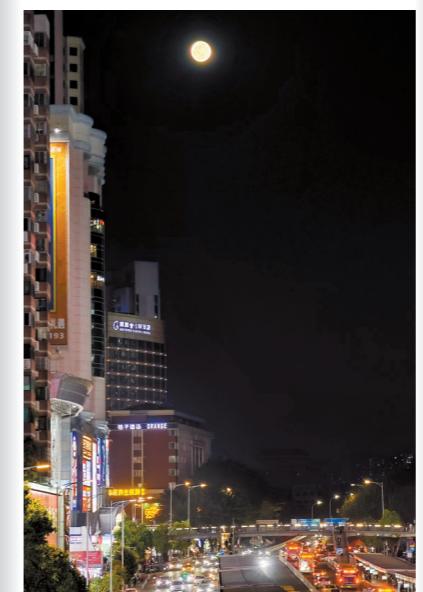
“1平米”可以做什么？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1平方米是房子的基本度量单位，标志着高房价的刻度，价值10多万元！但在很多小地方，1平方米是没有存在的可能，可能是储物的空间，扔玩具的地方，积满灰尘的不起眼角落。但如果放一个书架，上面放几本书，打开柔和的灯光，这“1平米”就发出了光芒，让人眼前一亮。这就是“1平米书架”这几个字一下子就吸引了我，在小县城，因为有了书，这1平方米有了比大城市1平米更大的价值！

“1平米书架”公益行动由新华书店总店和网商银行公益小站联盟共同发起，通过为小店提供免费公益书架和图书的形式，支持小店打造县域公共阅读空间，目前已经在全国20家小店落地。很有意思的组合，一个是旨在“深入推进全民阅读”的大书店，一个是专门服务小微经营者的科技银行，大书店+小微经营者，那如毛细血管般伸向经济社会每个角落的小微经营者，通过“1平米书架”这个小微的存在，努力去推进全民阅读。现在虽然只有20家小店，随着更多小店的加入，无数的小店，能汇聚成真正意义的“全民阅读”。

来夜市的人大多不是为了某种“生活必需品”，这里的消费是快乐的，纯粹的，“无用”的。一位广州艺术家在谈到80年代广州文艺时，曾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广东文学的一大特点就是不去追崇终极问题……为什么要谈这些问题？一天到晚想些生死问题、精神痛苦问题、孤独问题，得闹腾一下，吃炒牛河、狗肉煲，岂不更好？”

若是这样看，夜市其实是广东文化、广东人精神的一个缩影。

●随手拍



岗顶之夜

文/图 柴斌

大都市广州，既有激情澎湃的一面，也有温婉柔美的一面。农历十六的傍晚，散步来到天河岗顶，天清气朗，皓月当空；道路两旁车水马龙，灯光点点，犹如繁星点点。

随手拍专用邮箱:ycwbwyb@163.com

【昙花的话】 尤今 新加坡作家

喂孩子“吃”文字

尼日利亚

丹旅行，发现了一个共同

点：国民都嗜辣如狂。

深究之下，源头出在父母。

根据尼日利亚的习

俗，婴儿出生不久，父母亲

就会让他尝一点当地

让人头顶冒烟的鳄鱼辣

椒，作为欢庆新生仪式的

一部分。我感叹：“可怜

婴孩稚嫩的舌头，怎能

承受得了这种类似酷刑

的折磨！”他们却以一种“子

非鱼”的目光瞅我，说道：

“鳄鱼辣椒里面的辣椒籽，

一旦碾碎了，除了辛辣的

味道之外，还会释放出多

种香气，那是一种糅合着